

道教與北京宮觀文化

佟洵 編著

任法融題

丁亥之仲秋



B959. 2/10

2008

道教與北京宮觀文化

佟洵 編著

任法融題

丁亥仲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教与北京宫观文化/佟洵编著. -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5

ISBN 978-7-80254-002-6

I. 道... II. 佟... III. 道教-寺庙-宗教文化-研究-北京市

IV. B95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53143 号

道教与北京宫观文化

佟 洵 编 著

出版发行: 宗教文化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后海北沿 44 号 (100009)

电 话: 64095215(发行部) 64005092(编辑部)

责任编辑: 杨登保

版式设计: 高秋兰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权专有 不得翻印

版本记录: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30 印张 440 千字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500

书 号: ISBN 978-7-80254-002-6

定 价: 49.00 元

序 一

道教是中国本土宗教,它是在东汉中期产生的,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原始宗教信仰及先秦黄老道家哲学智慧的伟大结晶。从此以后,道教便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历史进程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并积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根深蒂固的因子之一。两千年来,道教的影响波及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举凡历朝历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学、医学、伦理、民俗等,无一不与道教有着或直接、浅近,或复杂、深刻的关系。也正是在这层意义上,鲁迅先生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

在中国道教思想发展史上,北京地区的道教有其特殊的地位与影响。据学者考证,上古时期,黄帝问道广成子于崆峒山,其地便在当时属于燕国的蓟县府君山,且黄帝死后即葬于平谷,可见北京地区曾是道家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战国秦汉时期,燕地颇多神仙方士,如司马迁《史记》所记载的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等“方仙道”术士,都是燕人,齐威王、宣王、秦始皇、汉武帝等筑台修观、登山入海,寻访神仙不遗余力,大多是受这些“依于鬼神”的燕地术士影响所致,可见北京地区古代道家文化思想渊源之深厚;再如北魏时期的著名道教改革领袖寇谦之也是北京(上谷昌平)人;尤其是金、元、明、清四朝均曾建都于北京,当时中国道教各种流派异彩纷呈,黄冠羽士,多驾车北游,以在首都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为谋求本宗发展之资本,皇室贵族,也多以与道士仙真辈交游为幸,流风所及,一时间北

京城内高道辈出,道观林立,香火鼎盛,为天下冠,例如太一道萧抱珍道长得金熙宗召见而在北京赐额创建“太一万寿观”,酆希成道长受元宪宗赏识而定居燕城天宝宫,全真教王处一、丘处机等大师联袂入京,先后受到金、元皇帝的礼遇,造成“千年以来,道门开辟,未有如今日之盛”的景象;到了清朝初年,王常月道长白云观高筑戒坛,中兴龙门,白云观成为“全真龙门第一丛林”,是天下道士向往、崇敬的圣地与祖庭……宋代以后,中国道教史上有很多大事件都与北京有关,也因此成就了北京地区道教的辉煌历史,并逐渐奠定了北京在全国道教界近千年的“中心引领”地位。截止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末,北京道观仍有近五百座之多,可见历史上中国道教在北京地区的发展势力是非常强大的,文化积淀也是非常厚重的。

在过去,道教与国家的春秋祀典及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道观是连接神圣诉求与世俗欲望、皇权主张与神权庇护、伦理道德与生死超越的交汇点。“关帝庙”或许最能充分地表现道观的这种世俗性的政治、社会教化、文化服务功能。明清两朝,北京关帝庙有近二百座,其最著名者,如地安门外的白马关帝庙。顺治元年,初定祭祀关帝之礼,首先便在这里举行,有清一代,重要的关帝祭祀活动,如雍正年间首封关帝三代祖父的仪式等,也都是在这里举行的。考虑到清代关帝庙遍天下的这一事实,那么北京白马关帝庙的政治中心地位及礼仪示范作用便昭然若揭了;再如正阳门外关帝庙,在清代也是全国闻名,当时有俗语云:“灵签第一推关庙,更去前门庙里求”,当年进京会试的各地举人,大都会到这里来求签卜问前程,到了每月初一、十五,正阳门外关帝庙会是全北京人都知道的一景,届时赶来求签问卜的、进香还愿的、作买作卖的川流不息、人山人海。由此可见,当时北京白马关帝庙以及北京道教对于当时人们实际生活的影响为何如者。

正是因为北京道教在中国道教史上乃至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有着如此重要的影响,有着如此显著的特征及独特的地位,故有今日佟洵教授《道教与北京宫观文化》之作也。佟洵教授十余年来一直专注于北京地方史特别是宗教史的研究,可以说,从规模及质量上来看,在区域宗教史研究领域,佟教授的一系列著作已经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从1997年出版《佛教与北京寺庙文化》迄今,陆续已有《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伊斯兰教与北京清真寺文化》、《宗教·北京》、《北京宗教文化研究》等系列著作问世,今天又完成了这部《道教与北京宫观文化》的编撰,这不仅为人们了解北京道教文化的历史沿革提供了新的资料及视角,更为佟教授一直构想的北京宗教历史文化的整体景观增添了新的华章。

通览全书,这部著作作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有关北京地区道教发展的颇为翔实的“信史”。佟洵教授先从北京道教产生的渊源说起,分述了北京道教近两千年的发展史,继而到北京道教种种独特的文化、民俗现象,如各种节日、丧葬、饮食、服饰、庙会等进行了翔实而生动的描述;本书第二、第三部分记述的是北京历史上著名的道观及道士,必有非常之人,方有非常之事,正是因为有这些矢志不渝地献身道教事业的大师先贤,北京道教的历史才显得如此灵动多姿,而北京城内这些著名的道观曾是他们坚韧意志、高尚情致的最佳见证,是他们那些惊天动地的故事发生的“舞台”。不过,联想到北京道教历史鼎盛时期曾有四五百座道观,而今留下名字的只有几十座,现在仍能发挥社会作用的不过区区几座,又不禁令人徒生一种怅惘、遗憾之情了。佟洵教授《道教与北京宫观文化》再现了北京三十多座道教宫观的历史与全貌,并成为国内外人士了解北京道教与宫观的平台。

总起来看,这部著作本着“立足现代社会,梳理历史衍变”的原则,以北京地区道教宫观为切入点,从北京道教演进历程、北

京道教宫观和著名道士以及道教碑刻四个方面,全面展示了北京道教的历史风貌,并深刻揭示了北京道教自身形成与发展的规律,文字既有历史的厚重、沧桑感,又有现实的生动、亲切感,这就使得本书在区域宗教史相关研究领域具有了自己鲜明的特色,特别是在北京道教研究方面,本书堪称为一部补白之作。我认为,本书的出版,对于让世界了解北京道教文化以及推进北京道教的进一步复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2005年1月,北京市道教协会成立,佟洵教授即担任北京市道协的监事长,对于道协的工作多有支持,也正是从那时起,我们双方开始筹划编撰这样一部全面反映北京道教文化历史沿革的著作。经过两年多的辛苦努力,这部著作终于完成了。值此写作序言之际,特向付出辛勤努力的佟洵教授表示由衷感谢!

北京市道教协会会长 黄信阳

2007年11月2日

序 二

北京这座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世界文化名城,之所以为世人瞩目,不只是由于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不只是由于她的日新月异,更重要的是她所呈现出的史学文化的深度和厚度。确切地说,她是一座汇聚着中国悠久地域文化的城市,并且仍在不断地发展、变迁、包容、创新。

“北京的文化”这一概念,从地域范畴上论,它的内涵绝非局限于目前的北京市,而是包含了目前河北的部分地区。从时间上论,“北京的文化”经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她是我国北方多民族在共同休栖、生活、劳动、融合中所造就的产物。就北京文化中的宗教元素来说,从琉璃河商周遗址的祭祀区到春秋战国之际的燕齐方士;从唐代幽州的天长观道全真派祖庭白云观,他在历史长河中,连绵不断,满目琳琅。时至今日首都北京,各种宗教、教派间和平共居,相安无事,互相尊重,互不干预。宗教建筑作为各宗教精神的载体,在京郊大地上层见叠出。它们是北京地区民族交融及中外交流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中华国都文化的物质遗存。

由佟洵教授及几位学者共同编著的《道教与北京官观文化》一书用大量的史料介绍了北京城历史上几十座有代表性的道教宫观的文化风貌及历史变迁,实为一项对北京道教文化的历史考古工程,是对世人的馈赠,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从该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作为本土宗教的道教,既有其深

厚的地源性,又有其经历磨难却继续生存、发展的必然性。本人从事宗教房产落实政策工作二十余载,对北京的寺庙、宫观、教堂、清真寺多有接触,深知这批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因为它们是不可再生的。见到此书本人颇感欣慰,因为追溯北京历史,将使得这座几千年古都更显她的光辉、博大和包融,将能唤起民众对北京城的怀念和自豪。我们应该认识到,民众对北京城的追奉是民心的汇聚,是对文化生命的延续,是依恋感的抒发。用城市历史文化的符号去激发人们对社会、国家、政府的信任、希望,这是何等有意义的行为啊!保护文化遗产,就是尊重这个民族文化的根基,坚持广泛、系统地开展全民教育,任重而道远。

一种宗教的形成、发展是与这个地域中民众的生活条件、经济条件、习俗环境、政治因素有着直接关系的。宗教文化是后人根据其运作的表现形式,针对他发展目的,将其分类、归纳并赋予名称,形成祠神、谶纬、方术、哲学、艺术等不同的范畴。这些范畴、领域留传所依托的,主要有两种典型的形式,即“文字”和“建筑”。“文字”有写在纸上的,也有刻在石头上或铸在金属上的。“建筑”有在地上的也有埋在地下的。但他们都是民众通过不同领域对历史的一种赞美和记载,留给后人的是这座城市的记忆,或可比喻为是城市的“DNA”。

• 而佟洵教授等学者们使用了大量的历史资料,明晰了北京道教的发展史,用详细、翔实的实物记载描绘出北京道教文化的变迁史。勾勒出北京城市文化发展的脉络,使北京城道教历史发展的原型得以还原。

故本人认为《道教与北京宫观文化》一书,是继《佛教与北京寺庙文化》、《基督教与北京教堂文化》、《伊斯兰教与北京清真寺文化》、《宗教·北京》、《北京宗教文化研究》、《北京宗教文物古迹》、《紫禁城里的神圣》、《当代北京宗教史》等出版后,又一本集史料性、学术性、可读性为一体的北京历史文化的著作。更可贵

的是该书的作者们,通过不辞劳顿的查阅、核对资料、实地的田野调查,对以前书中的一些内容进行了补充及纠正,使该套丛书更具实用性和史学性。

北京的宗教文化丰富多彩,佛、道教的寺庙、宫观在历史上数量极多,类型多样,五朝帝都,先后经历了 34 位皇帝。应该说,还有许多宝贵的宗教文化资源有待于进一步的挖掘、整理。值此《道教与北京宫观文化》一书出版之际,向佟洵教授及全体参与该书编写的学者们表示由衷的祝贺和感谢,同时也希望今后能够组织更多关注、热爱此项事业的人士参与到研究中来,让北京城的深厚文化底蕴更加绚烂多姿地展现在世人面前,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精彩立证。

北京市道教协会秘书长 南昌祺

2007 年 11 月于吕祖宫

序 论

长期以来一提起宗教,很多人会对它不屑一顾。其实,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和社会上层建筑,在人类发展史上一直对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各个方面产生着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从今天来看,世界上几乎不曾有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也不曾有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近代,学者们惊奇地发现,世界上各个不同的国家,彼此相隔遥远的民族,却有着几乎同样的神话和信仰。宗教传播和文化交流是开放的,是不受民族的界限和国与国界限的影响的。在人类的文化知识活动领域中,宗教一直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教在全部文化中努力扩张自己的影响,并且积淀在民族内部,成为民族的精华,构成了各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道教与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一样,是人类社会发展 to 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不过,道教又有其特殊性,它是深深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发源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大型宗教,是中国文化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如鲁迅先生所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系承传华夏古代的礼乐文明,吸收百家之长而成,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精髓。

一、道教与传统文化

道教是文化,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哲学、建筑、文学、艺术,以及自然科学和医学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日益引起现

代人的重视。

首先,从道教哲学来看:道教是我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道教哲学中,认为“道”是万物之本,天地之元,人格化的道就成了神,视为天尊,主宰着人类的一切。所以,天地万物的最高主宰就是道,是产生宇宙万物的根源。《老子》中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呵寥呵!独立而不改,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字之曰道。”东晋时葛洪又提出“玄”的概念,《抱朴子·内篇》中说:“玄者,自然之始祖,而万殊之大宗也。”其实,葛洪提出的“玄”也就是道,是产生世界万物的本源。唐代吴筠在《玄纲论》中,对“道”下了这样的定义:“道者,何也?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无外,其内无微。”总之,从根本上来说,道教的基本信仰和教义体现在“道”中,而“道”从本质上讲是唯心主义的。

道教虽然是属于唯心主义的哲学,但是在发展观上,它又是符合辩证法的。道教的理论和方法总的来说就是一个“变”字。道教经典《太平经》中写道:“天下凡事,皆一阴一阳,乃能相生,乃能相养,一阳不施生,一阴并空虚无可养也。一阴不受化,一阳无可施生统也。”这里是说,宇宙万物的生成变化是阴阳两个对立物交合而成的,是对立物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也承认变的思想。他写道:“夫存亡终始,诚是大体。其异同参差,或然或否,变化万品,奇怪无方,物是事非,本钩未乖,未可一也。”他还举例说:“谓夏必长,而荞麦枯焉。谓冬必凋,而竹柏茂焉。谓始必终,而天地无穷焉。谓生必死,而龟鹤长存焉。盛夏宜暑,而夏天未必无凉日也。极阴而寒,而严冬未必无暂温也。百川东注,而有北流之活活。坤道至静,而或震动而崩弛。水性纯冷,而有温谷之汤泉。火体宜炽,而有萧丘之寒焰。重类应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轻物当浮,而羊可有沉羽之流。万殊之类,不可以一概断之,正如此也久矣。”在这里,葛洪举的例子是多么生动而有说服力呀,同时也说出了客观事物是变化多端的,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

道教哲学吸取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而又有自己的理解,从而发展了我国的传统文化。比如天命观。天命思想是我国历史上传统观念之一,儒家信奉“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教,道教虽然也肯定天命说,但是有较大程度的保留。《太平经》里说:“人生各有命也,命贵不能为贱,命贱

不能为贵也。”但是,《太平经》里又说:“子欲知其效,同若凡人学耳。大贤学可得大官,中贤学可得中官,愚人学者可得小吏。夫小吏使于白衣之民乎!以是言之,犹当勉学耳。”这就肯定了后天学习的重要性,部分地否定了天命说。以后,道教又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更是肯定了后天锻炼学习的重要性。又比如天人感应、善恶报应。儒家学说的代表人物汉朝大儒董仲舒用一系列阴阳五行学说解释自然现象和人事的关系,具有极大的神秘性,令人们不知可否。道教的著作则认为,天能够感动人和物,而人和物不能感动天。王充《论衡》中说:“天能动物,物焉能动天?何则?人物系于天,天为人物主也。”这样,就反驳了儒家学说中讲天人感应时令人望天生畏的思想,也说清楚了人间政事和自然灾害没有直接关系。善恶报应思想也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思想束缚极大。道教著作中不这么认识。《太平经》中说:“地上善即天上善也,地上恶即天上恶也。故人为善于地上,天上亦应之为善;人为恶于地上,天上亦应之为恶,乃其气上通也。”又说:“凡人之行,或有力行善,反常得恶;或有力行恶,反得善。”应当说,这是对善恶报应思想的新解,有一定的进步性。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道教也是对传统观念有吸收而又有发展的,比如有力者助人、有财者分人、有道者教人,等等。此外,道教有自己的哲学术语,有固有的哲学范畴。比如用“混元”来说明宇宙的广阔无垠,用“承负”来表达报应的概念,用“道”来说明对宇宙万物本源的理解,用“有无”、“动静”说明事物的对立和变化,用“六情”、“六戒”说明修道者应当节制欲望,等等,这些也都是对中国哲学的发展。^①

其次,从科学发展史来看,中国道教的炼丹术是近代实验化学的前驱。众所周知,道教重要的方术之一是外丹黄白术。所谓外丹,它指的是丹砂、铅、汞等人体以外的矿物质,还有动植物药材等,经过人们在炉鼎等容器中烧炼,所形成的颗粒。道教中人把这称为仙丹,希望人服后可以长生不死。黄白术就是金和银的冶炼术,但是这里的金和银并不是实指金、银,而是金、银颜色的代称。因此,外丹黄白术实际上就是道教的一种炼丹术,炼出的丹呈现出好看的金银颜色。在道教中人看来,丹炼到一定火

^① 参阅王明:《道家与传统文化研究》下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候,能把普通的铜铁等金属点化成金银,这样,丹就炼成功了,人们服食这样的丹就可以成仙。如果不能点化成金银,就还要继续烧炼。

炼丹术在道教产生以前就已经在我国兴起了,《史记·封禅书》记载:“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记载炼丹术的书籍,在西汉时就已产生,以后随着道教的发展,相关书籍也不断涌现,比如东汉末魏伯阳撰有《周易参同契》,魏晋时期葛洪著有《抱朴子内篇》等。在这些书籍中,有的详细记述了炼造药银、药金的方法。隋末道士苏元朗在其著作《宝藏论》中,就记述了近30余种炼造药银、药金的方法。道教的炼丹术在实践中有理论指导,比如特别重视掌握炼丹火候,原料药物的配合也相当讲究。这里应当指出的是,道教因流派不同,炼丹的理论也不同。比如葛洪的传承派系,既重视人工炼制金丹,也重视点化金银术。金砂派则相信服药可以治病,可以保命,进而可以成仙不死。铅汞派认为铅汞的作用极大,同时还认为,在服食时,要有一定的思想作指导,这就是二仪、四象、五行之说。二仪即乾天坤地,四象也称四维、四兽、四神,五行即金木水火土。此外还有硫汞派,以易学阴阳说作为义理基础,用硫磺和水银合炼,以求神丹大药。

道教授丹术以火法反应为主要方法,也曾用水法,即溶解反应。在火法反应中,包括蒸馏、升华、化合(研磨)等方法。蒸馏法最常用的是由朱砂(Hgs)制取水银。在升华和化合反应中,常采用研磨法,就是把药物磨碎,使其易于发生化学反应。炼丹术士经常采用的炼丹方法是各种伏炼火法,包括炮、煅、养等火法。在各种火法反应中,要注意空间需密闭,这就还要掌握各种密封方法。此外,在炼丹时,还要有房屋,各种器具等。

从现代科学观点看,道教的炼丹术当然是非常荒诞的,非科学的。但是,他们积累的关于物质变化的具体知识,却是现代化学不能不重视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丹砂和汞的有关化学反应知识,二是铅的有关化学反应知识,三是砷化合物的有关化学反应知识,四是各种矿物的溶解反应知识,五是矿物学和冶金知识,六是火药的发明,七是秋石的制备等。就火药的发明来看,它确实和炼丹术有很大关系,传统火药的主要成分是氧化剂和硝石,还有硫和木炭。炼丹术中常用硝石和三黄(硫、雄、雌黄)等为炼丹原料,容易发生剧烈的燃烧和爆炸现象,这就导致了火药的发

明。总之,炼丹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近代化学的先驱。^①

再次,道教和医学的关系。道教的内丹学是专门论述和研究内丹修炼的学问,强调人体内精、气、神的转化,其中有许多涉及到医学。比如内丹术锻炼过程中,有药物一项,被称为“内丹三要”之一,正如元陈虚白在《规中指南》中所说:“内丹之要有三,曰玄牝、药物、火候。”这里的药物,实际上就是指人体内的精、气、神。我国历代的医学家,都非常重视精、气、神及其理论,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中。在道教的内丹学中,也把精、气、神看做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和物质基础,认为和天上的日、月、星,地上的水、火、土同等重要。精是人体各部分都含有的成分,是人体的基础。气是指人体脏器的功能活动,是人生命的根本。神是人体生命活动现象的总称,是精的外在表现。道教中的内丹学就是以精、气、神为锻炼对象,以便使后天消耗掉的精、气、神得到恢复和充实,达到健康和长寿的目的。《医方类聚》卷二百二对此记载说:“凡人修养摄生之道,各有其法,如平昔燕居之日,大概勿要损精、耗气、伤神。此三者道家谓之全精、全气、全神是也。三者既失,真气耗散,体不坚矣,曷能拟于仙道哉。”

道教内丹学中强调的精、气、神本是一体的,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转化过程中,三者互为其用,相互促进。徐春圃在《古今医统大全》中说:“乾元之气,化为精,精反为气,精者运于神,精益则神明,精固则神畅,神畅则生健。若精散则神疲,精疲则神去,神去则死。”林佩琴在《类证治裁》中也说:“神生于气,气化于精,精化气,气化神。故精者身之本,气者神之宝,形者神之宅。”不过,在内丹学中,认为精是基本,气是动力,神是主导。由于精、气、神三者之间能相互转化,所以,内丹术就把促进三者之间的转化作为练功的根本。传统内丹术还认为,精、气、神有先天和后天之分,炼先天的精、气、神最重要。当然,先后天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截然分开,它们本身是相互促进的。^②总之,道教内丹学中关于精、气、神的理论和实践,与我国传统医学中的气功学有密切关系,应当视为祖国传统医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而加强研究,以造福于人民。

^① 参见牟钟鉴、胡孚琛、王葆钗主编:《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齐鲁书社,1991年,第584—621页。

^② 同上,第622—686页。

道教和医学的关系还反映在道教的经典中有许多关于医学和养生学的著作,比如明朝编纂的《正统道藏》太玄部中,就有《黄帝内经》一书,该书是我国最早的医学理论的经典,在我国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所以,加强对道教经典的研究,有助于加强对我国医学宝库的挖掘。还应看到,道教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许多我国传统医学的内容,以充实道教本身的文化,这样,后来者研究我国医学,就不得不研究道教。比如,《汉书·艺文志》记载了方技略 36 家,其中大部分内容和传统医学有关,而这些内容后来几乎都被道教所吸纳。举例来说,方技略中有“经方”部分,就有专门治病的医方,包括治疗人体内五脏六腑的医方、治疗妇女和婴儿病的医方,等等。这些都是我国传统医学不同历史时期医学成果的经验总结,对后世医师们临床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①

道教和文学艺术的关系也极为密切。道教有自己的文学艺术,它们是我国文学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道教扩大社会影响的重要载体。

一是文学。道教经典中有许多文学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这表现在诗歌、散文和传记中。在诗歌方面,比如《太平经》,它是道教的重要经典之一,书中有三首整齐的七言诗,应该我国最早的七言诗,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还有《道藏》中收有的不少文集都是诗词,像全真道一祖七真的诗词,大都被收到《全金元词》中,也反映了它们在我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散文方面,比如《老子》是道教的经典著作,在文学上也有强烈的韵律感。清代邓廷桢在《双砚斋笔记》卷三中说:“诸子多有韵之文,惟《老子》独密。《易》、《诗》而外,斯为最古矣。”朱谦之在《老子校释》中也说:“《五千文》率谐声律,斐然成章。韵理既明,则其哲学诗之为美者可知矣。”这些都是对《老子》韵律的肯定。葛洪的《抱朴子》一书,大多用骈偶句法,文章非常华美,鲁迅在《中国文学入门书十二部》中,就列有此书。在传记方面,《道藏》中有不少传记,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比如《汉武帝内传》,写汉武帝希望长生不老,羡慕神仙,结果西王母与上元夫人下降内宫,接见了汉武帝。无论是烘托气氛,还是场景描写,抑或是人

^① 参阅王明:《道家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228-233页。

物刻画,都表现了很高的写作技巧。

二是艺术。道教艺术主要包括和道教有关的绘画、雕塑、建筑等,它们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绘画一般是人物像,是道教祭祀的神仙像,在南北朝时已经出现。《太平经》中就有“五藏精神”画像的描绘。葛洪《抱朴子·杂应》中对“老君真形”的描绘更加具体:“身長九尺,黄色,鸟喙,隆鼻,秀眉长五寸,耳长七寸,额有三理上下彻,足有八卦,以神龟为床,金楼玉堂,白银为阶,五色云为衣,重迭之冠,锋铤之剑,从黄童百二十人,左有十二青龙,右有二十六白虎,前有二十四朱雀,后有七十二玄武,前道十二穷奇,后从三十六辟邪,雷电在上,晃晃昱昱。”道教的神仙像在这里栩栩如生。王淳在《三教论》中,也有道教神像的描绘:“近世道士,取活无方,欲人归信,乃学佛家制作形象。假号天尊,乃左右二真人,置之道堂,以凭衣食。宋陆修静亦为此形。”这些道教神仙像,使道教在人们的心目中具体化了,有利于道教的传播和发展。

几乎和道教绘画问世的同时,道教雕塑也产生了。北魏寇谦之新天师道的道场坛宇中已经有了天尊塑像。北宋时,在福建泉州清源山,开凿的老君坐像高5.1米,厚7.2米,宽7.3米,背山倚松、双目平视、微露笑容、态度安详。在山西太原晋祠圣母殿中,宋朝彩塑的侍女像,有的神态娴静、有的含情微笑、有的似有所思,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武当山金殿内的玄武像,是明代道教的著名雕塑。该像是鎏金铜像,重二万斤,两旁有水、火二将和金童玉女,造型均非常优美,很有艺术价值。

白云观建筑格局就是道教宫观建筑的典范,采取八卦方位布局,有明显的中轴线,具有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特色。另外,白云观以收藏道教文物最丰富,而且保存最完整而闻名于国内外。如今珍藏在白云观三清殿内的明版《正统道藏》如今已成孤本。观内文物陈列室里唐玄宗李隆基赐给白云观的一块用汉白玉石雕刻而成的老子坐像,是古代石刻中的珍品。镶嵌在观内祠堂院中北房墙壁上的《松雪道德经》和《阴符经》石刻,原本出自元朝大书法家赵孟頫之手,现虽是清代道光年间仿元拓本复刻的,但它仍然是古代书法作品中的精华。明版《正统道藏》、唐代石刻老子像和石刻《松雪道德经》不但是稀世道教艺术珍品,而且是白云观的镇观三宝。白云观山门上悬挂着的“敕建白云观”匾额,也与其他寺庙不